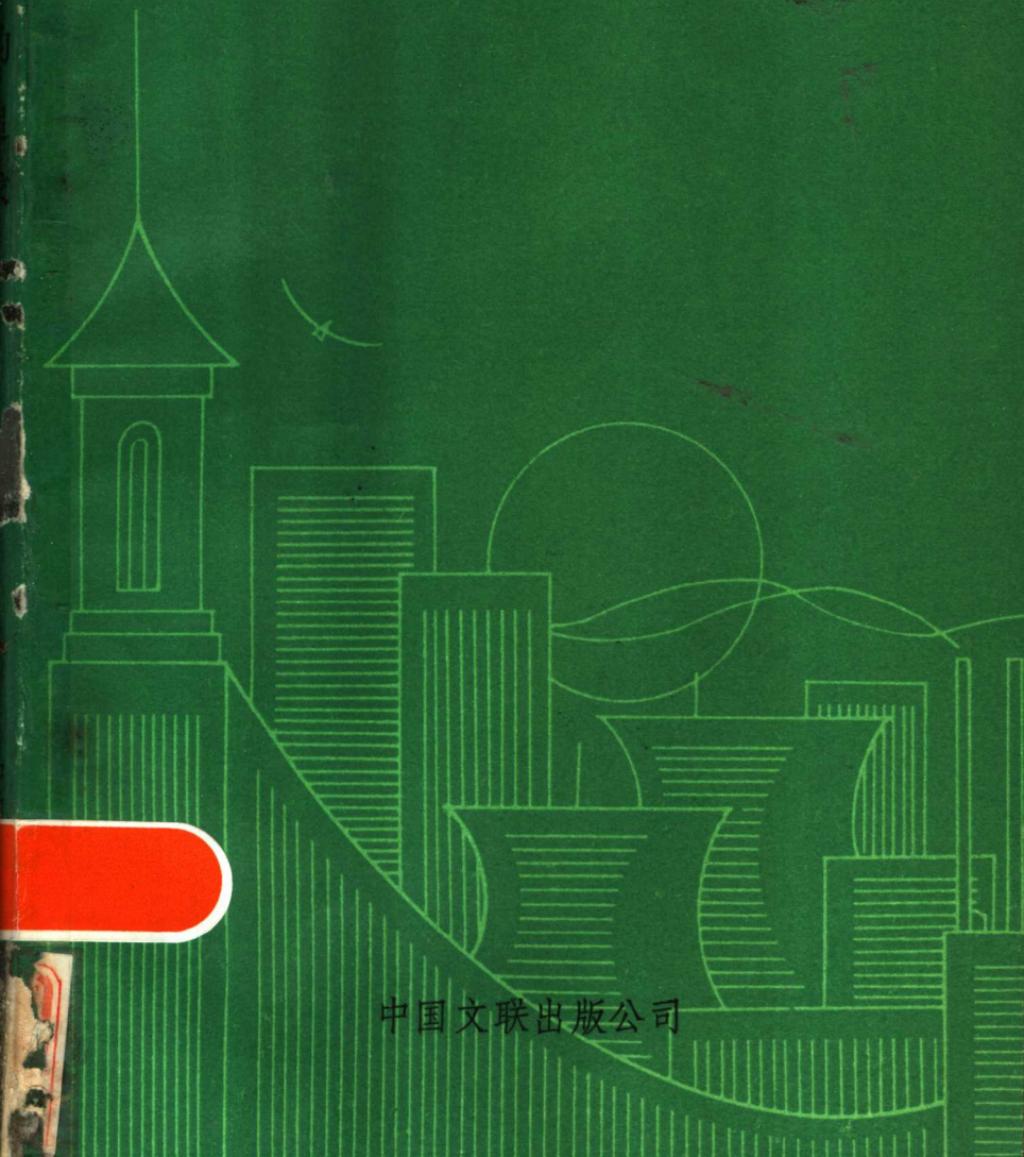


绿色的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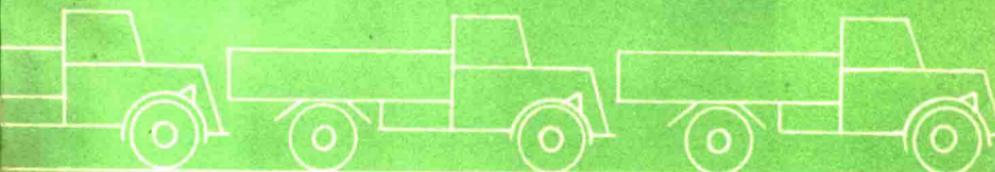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25
5601

绿色的追求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绿 色 的 追 求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东北师范大学第二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8印张 2插页 184千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长春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统一书号：10355·305 定价：1.25元

责任编辑 王维民

内 容 简 介

本书收集的二十余篇作品，是从近年来反映我国汽车工业的摇篮——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改革形势的上百篇报告文学中精选出来的。作品以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热情讴歌了广大汽车工人勇于开拓，锐意改革，为振兴祖国汽车工业奋力拼搏的革命精神和爱国热忱，展现了广大汽车工人多彩多姿的时代风貌。本书文笔流畅、热情洋溢、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序

刘绍棠

这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书，一部运用艺术手段写成的史书。这部书唤起我对五十年代初的回忆，历历在目，往事如昨。

在大运河边的通州路河中学操场上，召开全校大会，欢送几位初中同学，为创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到北京接受培训。这几位初中同学胸前佩戴大红花，站在台前，有如出征的战士；我以学生会主席的身份致欢送词，并和他们紧紧握手，依依惜别。

那时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还只是一片满目荒凉的原野。

现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已经是闻名中外的汽车城，三十年来一直是中国汽车工业的主力。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国土上，城市、农村、边疆、国防线上……四面八方奔驰着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出产的解放牌汽车；为全国人民家喻户晓，为全国人民充分信任，更被全国人民引为骄傲。

因此，我阅读这部书的一篇篇作品，都产生抚今追昔的感情，忆苦思甜的激动。

忆苦思甜，曾经被极左政策滥用了，用滥了，以致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但是，对于我和我的同辈人，更不用说我们的前辈，每看到我们的一项成就，在欣喜若狂的同时，便不禁回想起我们祖国那贫困、落后、被欺凌的过去。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都哭了，淌下的是翻身解放而又满腹辛酸的眼泪。在这之后几年，当我们从广播里听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制造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辆自己制造的汽车时，我们也哭了，淌下了欢欣鼓舞而又不堪回首的眼泪；因为，这标志着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跑起来了，飞奔在前程似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大道上。

有人说，现代化的青年一代，不喜欢纵比，而喜欢横比。因为纵比使人沾沾自喜，忆苦思甜令人满足现状。是的，极左政策为蒙蔽和愚弄人民，曾蓄意利用纵比和忆苦思甜为手段。但是，若要历史唯物主义地认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深刻理解中国的国情，纵比和忆苦思甜都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真正以天下为己任而又脚踏实地的时代青年，不是数典忘祖的人，不是妄自菲薄的人，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他们懂得无比怜惜前辈创建的基业，继承、改革、发展，取得更大的成就。鲁迅先生所批评那种想自己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上天的人，绝不是当代青年的形象。因此，我相信，广大青年读者也会爱读这部书。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所以，我愿为《绿色的追求》写序，不免感情用事地写下以上这些文字。

1985年7月写于蝈笼斋

目 录

序	刘绍棠	(1)
在八十年代的跑道上	赵鹏万	(1)
正是车城好风景	刘允章	(14)
为了“红旗”第二代	李 蕴	(28)
乳白色的“解放”	长 山 文 海	(42)
追求者的脚印	戴秀梅 曹正厚	(51)
总指挥和他的妻子	刘允章	(61)
话说“张政府”	赵鹏万	(85)
建筑在向高层进展	张学志	(99)
系着五彩丝线的人	赵振华	(109)
爱之光	刘允章	(117)
时间的主人	赵振华	(132)
不锈的机关枪	李 蕴	(137)
“新长征一号”的诞生	郭绍彦	(146)
绿色的追求	赵鹏万 史 璜	(154)
生死搏斗一百天	孙兴家	(195)
母 爱	王训军 曹正厚	(207)
春风从沉睡中醒来	吴运民	(215)
少年是春天	王成玉	(237)
事业在他心中	齐子贵	(245)

在八十年代的跑道上

赵鹏万

一九五六年以前，我国重工业产品统计表上的“汽车”一栏是“0”。直到位于吉林省长春市西郊的第一座汽车工业城兴建、落成、开工生产，这才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

时间的车轮在飞转，弹指间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解放”牌汽车，累计产量已突破百万辆大关，一九八三年二月的统计表上是这样写着：“一汽：1,000,000”。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四日，新中国的第一辆汽车诞生了，从那天起，二十多年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者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他们不仅把一辆辆穿着绿色、蓝色盛装的“解放”，送往全国各地，而且对五十年代的原设计作过千余项大大小小的改进。年产量已由五十年代的一万五千辆提高到八十年代的七万辆，为国家积累了相当于历年投资总额的六十二倍的资金。

车城无处不飞花。这座拥有五万职工、二十三个分厂的大厂，早从一九五八年起就由单一品种（“解放”）的生产发展

为多品种生产了。厂里的设计师们，在全国狂热地大炼钢铁，大放“卫星”之际，居然能够头脑冷静地设计出“红旗”牌高级轿车，并很快投入了试制；一九六三年起又陆续生产了越野车、翻斗车。十年内乱之后，汽车厂医治了内伤、外伤，有了更为可喜的成果：由“红旗”轿车派生出来的“红旗”高级旅游车问世了，在广交会展销六天，被抢购一空，外商赞誉为汽车行业的一块“金字招牌”；由越野车派生出来的加长公共汽车底盘生产出来了，满足了许多地区交通运输的急需；一百五十匹马力的汽油机、一百五十五匹马力的柴油机也在紧张地试制中……

成绩仅仅是起点。面对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汽车厂的第一代建设者们没有忘记五十年代建厂时期的情景：党中央发出全国支援第一汽车厂的号召后，从长江两岸，黄河之滨，兴安岭下，椰子林边……开来了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红领巾们寄来了卖废纸废铁积攒的钱，老太太寄来了压在箱底的玉镯、金簪；六亿人民伸出了温暖的手，六亿颗心和汽车厂一起跳动……今天，这个厂的“元老们”，有一万七千余名早已支援“二汽”、“北汽”、“南汽”、“川汽”等几十个兄弟厂去了，留下的大部分都已年老体衰。可是，汽车工人队伍恰似奔流不息的长江水，后浪推前浪，仍然浩浩荡荡；第二代汽车工人已成为生产的中坚力量。

如今，汽车城里里外外，从翻砂造型的铸造分厂到加工“心脏”的发动机分厂，从冲压“服装”的车身分厂到绿浪奔涌的总装配分厂，从设计大楼到后勤部门……都参加了向新产品进军的雄伟行列。那建设的热风，那竞赛的浪花，吹溅在二百个车间的工作台上……请看，两代建设者在八十年代的跑道上昂首飞奔的雄姿——

知 难 而 进

“这老头真行！有事业心，有干劲。”这是锻造分厂的工人、干部，对调来担任厂长不到两年的林云甫的评价。

林云甫，江苏无锡人，一九五五年不远千里从上海来到长春支援汽车厂的建设。这位老八级工，六十年代初提为干部。光阴荏苒，初来时的小伙子，现在早已年逾五十。可是他那从不认输的刚毅性格，加上红润的面孔，健壮的体格，充沛的精力，并不给人以苍老的感觉，仿佛青春的花朵尚未凋谢。

他原是发动机分厂厂长。那里领导班子团结，干部配备齐整，工作顺手。在他任职期间，发动机分厂变化很大，一九七八年被评为“大庆式企业”之后，年年都是先进集体。

八十年代的第一个秋天，总厂党委副书记告诉他：“老林，党委要派你去锻造分厂，怎么样？”

“好吧，三年为期。干不好，我卷铺盖滚蛋！”林云甫回答得干脆利落。

“困难不少呀，你有什么要求？”

“现在还没有。”

林云甫就要赴任了。当时有多少人为他捏着一把汗呀！

和他相识的同志悄悄规劝他：“锻工出身的厂长都干不了，你对热加工一窍不通，冒那个风险干啥？”“你要去至少也得带几个得力的人，要不到那儿你就跳光杆舞了！”……

但是，林云甫含笑摇头，似乎早有成竹在胸。他单枪匹马跨进了锻造分厂。

按说，三千职工的发动机分厂他都能应付裕如，仅仅一千多人的锻造分厂，凭他的经验、能力，还对付不了吗？可林云甫并不这样想。他说：“我从没有低估这个厂的‘老大难’程

度。”林云甫一进锻造分厂，就拿出了常用的“钥匙”：调查研究。他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走遍了车间、科室、班组、库房，谈心、座谈、家访……笔记本记得密密麻麻。象大夫了解病情一样，这些新鲜的第一手材料，使他逐步找到了症结的所在。

这年的冬天似乎来得特别早。锻造分厂由于厂房高大，保暖设备陈旧，炉前的工人要受火烤，清理工人却守着门口喝西北风。十月初第一个星期六的夜里，天空飘落了第一场大雪。星期天早六点钟，林云甫就冒着风雪闯到管生活的副厂长和行政科长家里，分头动员后勤职工马上进厂，采取了紧急防寒措施。星期一工人一进大门就愣住了，高兴地说：“这可真是破天荒，今年能不挨冻了。”

林云甫保持了老工人的本色，喜欢直来直去，照本实发，厌恶谄媚、奉承，曾不止一次把吹捧他的人顶了回去。有一回到食堂买菜，他发现自己的那盘比别人的多，便端着菜找到管理员，补交了钱，告诫他要教育食堂人员，不应看人打菜，要一视同仁。

好，你老林头不是爱管事吗？那你管去吧，连工人借款这样的小事也找到厂长头上了。

林云甫提出了意见：“今后我不批这种条子了。请你记住：一、借款都要由互助会解决；二、没有偿还能力的，工会考虑救济。这样免得让借款的工人楼上楼下跑。你看行不行？”

“行啊，林厂长。”口气上倒听不出这是违心之言。

工作局面就是这样逐步打开的！

“老林头在发动机挺能耐，到锻造就玩不转了！”

“咱们看他怎么当光杆司令吧！”

这些风言风语哪里来的？工人们背地告诉他说：“说这种话的不多，就是会‘玩轮子’、当年出过‘革命风头’的那几个。”

“嗯。”林云甫不争不辩，但他在琢磨扶正祛邪的对策。

多年来，这个分厂没有合适的人抓技术工作，致使生产一直处于应付、被动的局面。他求贤若渴，开始注意物色有真才实学，有事业心的人。经过一年多的了解，在党委会他提出了把两名工程师提为副总工程师的建议。有些人甚感意外，有的竟重弹什么“他不是党员”等“左”腔老调，妄图阻挠。林云甫和分厂的党委书记，则以党的政策、生产的需要和这两位同志的表现，耐心解释说服，同时报请上级批准任命五十年代大学毕业生陈秉森、徐志钧为锻造分厂副总工程师。他俩一个协助抓生产，一个抓技术，再也没人敢拿生产技术问题胡弄领导了。这又给幸灾乐祸、冷眼旁观者以沉重一击……

林云甫深有体会地说：“搞好企业，主要靠领导班子的协调，职工的干劲和管理科学化。要实干，不要要嘴皮子，搞那些花架子。”是的，锻造分厂正在提倡实干，抵制“虚干”，各方面比过去有了起色：底盘、发动机分厂的调度员虎着脸上门来催急件的被动局面消失了；基础管理大有改进，原始记录凭证齐全了；一整套指标考核，奖惩办法付诸实施了；生产面貌一新，职工们共同写下了两个大字——“文明”……

当然，用林云甫的话来说：“距离彻底好转，远着哩。”屈指一算，“三年为期”已经过去了大半。头三脚踢得不错，人们相信他以后会踢得更好！

“香港不能去”

潘绍云的少年时代，是在上海度过的。他的父亲解放前开

过客栈，解放后公私合营做了一名普通职员；一九五八年因“反党言论”，被送到外地劳动教养。母亲领着三个孩子度日，为生活所迫，撇下小潘兄妹俩带着幼子于一九六二年到香港和她的父亲一起生活去了。当时小潘仅十岁，却俨然长兄为父，照顾着妹妹在同一个小学读书……

一九六七年，他初中毕业了。妈妈从香港寄来三百元，叮嘱儿子不要下乡。可是潘绍云已经有了点“大丈夫”的气概，他觉得自己已经十五六岁了，身大力不亏，怎能做不劳而食的寄生虫呢？后来，他千里迢迢来到了吉林省安图县长兴公社插队落户。

力量来自自信念。只有对生活失去信心的人，才会在艰难困苦的逆境中消沉、颓废。小潘这个在新中国出生、长大的孩子，凭着对党的信任，对祖国的挚爱，用双手改变着集体户的困境。他用小老虎般的劲头干活，两个月后就被大家选为户长。生产队对他也极为信任，竟派他带着人参加水电站的挖土工程，而小潘也不负众望，在工程结束时为生产队扛回了一面红旗。

生活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更何况处在乌云压顶的年代。

一九七一年夏的一天上午，小潘正在给亲友写信，告诉他们自己即将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消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使小潘停住了笔，转眼一看，是生产队长阴沉的脸。小潘吓懵了，讷讷地问：“队长，找我有事吗？”队长长叹一声：“公社刚来电话，说你有海外关系，政审不合格，指标给别人了。”

“哦！”小潘一下子从希望的山巅跌进了失望的深渊。他的信念动摇了，觉得生活变得苦涩，人情变得冷漠，劳动变得沉重……呵！前途，前途在哪儿？后来，好心的生产队长一趟趟去公社“刺探情报”，看有没有招工指标。可谓天从人愿，他终

于给小潘要来了个招工指标。呵！小潘快要熄灭的希望之火重又燃起。

一九七二年潘绍云来到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同时进厂的许多青年，都不愿到又脏又累的铸造分厂去。可小潘却对分配工作的干部说：“我上铸造好了，我不怕。”凭着高高的个子，结实的身板，果然分到铸造分厂活儿最重的大件工段。他竟甘愿和每个净重一百六十七斤的零件打交道。

潘绍云把如花的青春许给了汽车工业。为了校正好铸件，他绞尽脑汁，改进设备，脚砸了也不休息。进厂三年就当了生产组长，后来又当了工段长。十年来，他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或标兵，总厂还命名他为一九八一年度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的模范。

信任和荣誉，鲜花和掌声，激励着潘绍云的献身热情。而来自另一方面的诱惑又在他的面前提出了新的课题：一九八一年春，在香港的妈妈、弟弟、外祖父、舅父等先后来信，劝他带着妻儿到香港定居。特别是妈妈的脑神经长瘤之后，思儿心切，来了封言词痛楚的信：

……我现在不知是良性瘤还是恶性瘤。如果是恶性的，我将会不久于人世，我们母子今世可能难以见面了。你若念养育之恩，就马上办来香港手续……

接着，弟弟来信告诉他：香港的物质生活条件大大好于内地，外祖父已为他安排了如意的工作。信里还附着妈妈诊断书，可作为申请出国的依据……

这一封封信呵，象一颗颗石子掷向小潘的心湖，使他心烦意乱，坐卧不安。饭量减少了，面容憔悴了。他给亲人回信：暂时离不开，还要跟妻子商量商量……

一九八一年初夏，车间主任通知他：“小潘，最近看你瘦

了，厂党委决定送你到北戴河去疗养。”

“让我去北戴河？”小潘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对。你明天就别上班了，在家准备一下。”

“不，我不去。我年纪轻轻的，让老师傅去好了。”

主任笑呵呵地说服他：“劳模标兵都要轮着去的。小潘，你就别推让啦！……”

这天夜里，小潘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睡。记忆的荧光屏上，映出了一张张亲切的脸：亲手给自己戴上红领巾的班主任，关心自己成长的中学老校长，厚道热诚的生产队长，手把手教干活的师傅……怎能离开他们，离开生我养我的地方？！

他终于作出了抉择。第二天天刚亮，他推醒了妻子：“我想好了，香港不能去。咱们拍张全家照给妈妈寄去吧。她会谅解的。”

“那你还说要收拾东西干啥？”

“咳，我不是要上北戴河疗养吗！”

“我不信，你骗人。”

潘绍云深情地望着妻子的脸，自言自语：“是呵，这要在过去，好象是梦想。可是现在，这是真的，真的！”

祖国的朝阳升起来了。夫妻俩沉醉在无比的欢乐与幸福之中……

心里装着汽车

前不久，第一机械工业部批准汽车厂三十七名工程技术人员晋升为高级工程师。这是随着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而成长起来的第一代汽车专家，其中就有车型设计科副科长、共产党员潘盛兴。

老潘刚过五十岁，精力旺盛，朝气不减当年。他和他的爱人——吉林省京剧团梅派青衣演员周秀兰，有个夫妻协定：生活上克服点，事业上勤奋点，我画图，你演戏，互勉互助，隔行不隔山，总目标只有一个。他们结婚十余年，对本协定信守不渝，事业有成，感情弥笃。

潘盛兴一九五三年毕业于山东工学院。三十年来，他把全部心血都献给了汽车制造工业；想的是汽车，干的是汽车，就连他孩子玩的也是汽车。床上，地下，除了汽车玩具，就是国内外的汽车画报、图片。两个十多岁的孩子，都有丰富的汽车知识：“这是‘丰田’，这是‘本茨’……”周秀兰这个演员，也常常念着锣鼓经或哼着《凤还巢》，手里翻着《汽车工人》报；厂里的同志来了，她也会关心地问：“听说你们搞了个节油的化油器，一百公里能省多少汽油？……”

老潘和汽车结下了不解之缘，爱得执着、深沉，为设计某种车型，即使担风险也在所不顾。一九七四年，正当“批林批孔”甚嚣尘上，知识分子大气也不敢喘的时候，鞍山钢铁研究所有位干部来到汽车厂，希望能帮助设计一种适用于矿山的大型载重汽车。这不是国家分派的任务，那时又只要“革命”不要生产。所以，大家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时髦态度，谁愿出这个头？

潘盛兴却有点与众不同。他回家和周秀兰商量：“为了给国家争口气，我想和大家伙设计个一百吨车给矿山用。可是孩子年纪小，说不定还会出点什么事，你……”

“干吧，现在不让我演戏，你再不搞汽车，事业不全荒废了！孩子我管，要你操什么心？多余！”

“秀兰，这可不是领导布置的任务。我们只搞了个‘民间协议’，科里十几个同志愿意一起搞，肯定是吃力不讨好的事

情。”

周秀兰是个爽快人：“别想那么多，能对得起国家就行。”

老潘又“嘿嘿”一笑，竖起大拇指称赞说：“不愧为穆桂英的性格。”

于是，他和同志们一起拿起了笔，蘸着心血和汗水，蘸着晨光和夜色，画了四个多月，终于设计出一套“一百吨电动轮自卸车”图纸，并在一九七七年于湖南试制成功了。

糟蹋革命的“文化大革命”，栽培了一批要权术、好整人、不学无术、“嘴巴基本功”过硬的家伙。这些家伙见一百吨车居然搞成了，一个劲热讽冷嘲、旁敲侧击，说老潘“不务正业”，“没事找事”，“吃饱了撑的”，“不象个科长”等等。可是，历史是公正的，由于老潘和同志们在汽车工业发展史上写了崭新的一页，填补了一项空白。一九八一年终于荣获了一机部的创造发明一等奖。

进入八十年代，汽车厂吹响了“解放”牌“改型换代”的号角；车型设计部门的担子就更重了。老潘一面工作，一面不断充实知识。他刻苦攻读外语，除了已掌握的俄语、英语外，现正在学习日语、德语。周秀兰深夜演戏归来，见他正在灯下背单词，学语法，常开玩笑说：“将来新型车打进国际市场，你就出去卖车吧，厂里也不用找翻译了。”

老潘总是“嘿嘿”地笑着回答：“会有这一天的。”是啊，他心里总是装着汽车呀！

年轻的探求者

“我们是从一九八〇年下半年开始，把集成电路用在汽车生产上的。这是第三代电子器件。”

“那么第一代、第二代是什么呢？”